

九谒先哲书

写给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

黎明通知书

● 夏中义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九谒先哲书

上海文化出版社

● 夏中义

著

责任编辑：陈鸣华 孙 欢

封面设计：官 超

九谒先哲书

夏中义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i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82,000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册

ISBN 7-80646-238-4/I·301

定价: 22.00元

序

徐葆耕

冗务缠身会使人的思想陷于昏睡。每天忙于俗事时，想的都是如何“应付”，很少去质疑诸事所以如此的前提。我想，这是庸人之所以成为庸人的原因之一。良夜扪心，常有悲凉之感袭上心头。每当如此，便想披衣起床，找点书翻翻。深夜乱翻书，不同于白天，不是为了备课，更不是为了给上级“打报告”，而只是寻找一根针，能把昏睡着的灵魂刺痛、刺醒。其时常读的是一些年轻人写的锋芒毕露的文章，由于年龄的阻隔，在理性上未必认同，但在心灵上却获得一种针刺般的痛感、快感。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显然比那些年轻人老到得多、谦和得多，但于老到与谦和之中分明藏着一颗桀骜不驯的灵魂。读他分析王国维由于学统与道统相冲突终走向自沉的文字，真感到像一把解剖刀在我的五脏六腑中搅，我所获得的已不是一般的刺痛感，而是颠覆灵魂的震撼。读完《谒王国维书》时是凌晨三点钟，我终于无法再入睡，直到天明。

近几年学术界提倡“规范”，这无疑是很必要的，惟倡

导规范的本义是给思想以科学的骨架，而不致变成权力、金钱或时髦思潮的奴婢。但历史又告诫我们，任何思想在其萌芽时恐是很难规范的，如果把规范抬得至高无上，思想就会变成规范的奴婢。我常为弗洛伊德庆幸，他是个欧洲人。倘活在当代中国，他对梦的解释会被当作最无规范的垃圾来嘲弄。中义是忠于科学理性的，他对二十世纪学人的研究足够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但他却采用了眼下的这种文体。这本书的学术容量却不低于学术论著。但其中最珍贵的却是字里行间洋溢着的颖悟和机智。正是这些非纯逻辑论证的话语，与许多鞭辟入里的分析交融在一起，构成了本书的魅力所在。

作者的着力点不仅在前贤们的学术遗产，更在于触摸学术背后的灵魂，即作者自谓的“人格寻根”。在《谒胡适书》中，作者写道：

此根在心底埋得很深，近乎本能，是孩提时吸吮母乳便融入血脉的，故与其说它是文化心理现象，毋宁说它更像神经末梢，极其纤微过敏，一俟被感动，便牵一丝而动全身，如电脉冲，沿脊椎寒寒窸窸地传导，以至人体颤栗，不可不倾心且委身之。它可被体悟，却难言传，因人的自我知解力有限，不易抵达深层，或人往往可表白自己为何如此作为之心境，却无计言说此心境何以发生，这一更为深邃的深层精神存在便是我所谓的“人格之根”，亦即灵魂。

这是一种探险,也是一种冒险。因为深入探寻“人格之根”,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将心比心”,拿自己的灵魂作抵押。在中义操着解剖刀,去解剖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巨子的“人格之根”时,我分明看到他也在解剖自己。在解剖刀上滴着的,也有他自己的血。

王国维在谈到尼采时说过:“吾爱以血书者。”我深有同感,故愿向读者推荐中义的这本书,并以此激励自己。

1999年9月,清华园

目
录

序徐葆耕[1]

1 学统的分娩及其人格载体/谒梁启超书 [1]

若曰乾嘉学派为旗帜的清学传统是现代学统的最初受孕,那么,这学统胚胎是在先生的思想子宫发育得最好,而尊著《清代学术概论》则是其学理性分娩。

2 价值位移:从青年到晚年/谒王国维书 [22]

既然先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一学人,年轻时便对学统有高度自觉,则何以在辛亥年后要毅然诀别自己曾倾心的文哲之学?何以至晚年(1923)会屈尊应召到紫禁城任废帝之“陪读”?又何以在北伐军威逼京城时(1927)拖着前清长辫而自尽深渊?

3 用生命践履碑铭/谒陈寅恪书 [52]

先生碑文倡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实是将乾嘉学风所孕育、后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思辨洗炼过的现代学统,提纯为简约明澈之“八字方针”,当更见学统的文化含量之凝重且幽邃。其间,“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风骨清傲,魂灵才得以发扬。

4 人海沉浮非书生所宜/谒吴宓书

[76]

当先生欲积极入世，以图事功，此即接近中古道统；当先生欲寄情艺文，怡然著述，这又近乎现代学统。一马道统，一马学统，就平素理智而言，先生欲“二马比肩并进”；但就深层情怀而言，则先生更“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

5 启蒙巨匠与“上卷先生”/谒胡适书

[100]

先生本无意于成为学有专长的纯粹的学人。“学人”这顶帽子，在先生眼中，未免尺寸太小，搁在头上，当不过瘾。后辈以为先生最适合戴“启蒙巨匠”这顶帽子。

6 生于斯死于斯的史家悲剧/谒吴晗书

[156]

后辈看先生的人格特征有二：一是书生当官；二是当官犹存书生气。本来，书生与官吏是两种行当，亟须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但先生却试着合二而一，“两栖类”，亦政亦学，亦官亦文，着意在一统体制内持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这是先生人格之可贵处，也是日后不免碰壁的麻烦处。

7 史诗之烈 诗史之哀/谒闻一多书

[199]

先生之生生死死所以耐人寻味，实在是先生之人格构成太博大，太独特；不仅涉及革命史，更涉及学术史、诗歌史；不仅享有哀荣，更发人哀思；斗士、学者、诗人这三重角色之间，不仅有朱自清所赞许的圆融近乎完美，也有因多重角色之各各衍生而不免生发的彼此牴牾或耗散。

8 世纪圣人的精神遗体/谒冯友兰书 [255]

先生作为中哲史界的“天下一人”，百年风云集一身，不仅生前曾大宠大辱转大悲大喜，且身后至今仍毁誉不一，当堪称世纪性的“冯友兰现象”的第一主角。好在先生晚晴率性，不憚将自己的思想及生平作“精神遗体”，让后世去解剖。于是，这叠谒书也就成了后辈对“精神遗体”的一份慎重而系统的解剖报告。

9 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 [321]

自 1969 年陈寅恪含悲倒下后整整 20 年间，国内学界几无一人能像先生那样深挚地眷恋且追认清华对百年中国学术的历史性地位与影响，且在晚年主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所列 20 位重要学人中，竟有 8 位涉及清华背景，这便使历经风雨的“清华薪火”在百年明灭、几剩奄奄一息之世纪末，有幸系先生之余年而得复燃矣。

【附录】

学术反思与文化“着陆”……庞 朴 夏中义 [415]

没有地址 抵达灵魂 ……刘锋杰 [422]

千禧夜答弟子问(代后记) ……夏中义 蘊 梅 [450]

①

学统的分娩

及其人格载体

／ 谒梁启超书



梁启超(1873-1929 年)

梁启超先生：

这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所以执意书呈先生，实是因为拜读了尊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于吾心有憾憾焉”，才突发奢望，若先生真能不吝赐教，后辈三生有幸。

说实话，未读尊著时，后辈对先生是敬而远之的。先生为我国晚近史上的一代骄子，我，一介书生而已，当“敬”无疑；但又“远之”，因先生首先是搞宣传的（袭用李泽厚的说法），是以擅长鼓动而炳彪史册的政治活动家，一俟涉足学术便不免疏阔（据说朱维铮校勘尊著时纠错达百余处），于是明知先生有此力作也懒得去翻。直到近年因痛感国中历来有政统、道统，独缺人文学者赖以安身立命之学统，进而臆测曾为学界所不

屑的乾嘉学派倒可能孕有现代学统之胚胎，由此再觅新近重版之尊著，谁知一卷在握，竟读得如醉甘霖，夜不能寐。

后辈读出先生之本义，是要通过论述清代学术来弘扬“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即一代而已见其概”^①。

但窃以为尊著的分量恐远不侔于此；后辈的看法是，若曰乾嘉学派为旗帜的清学传统是现代



梁启超书影

学统的最初受孕，那么，这学统胚胎是在先生的思想子宫发育得最好，而尊著则是其学理性分娩。这就是说，尊著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实绩，不仅在于高举了乾嘉学派的科学研究精神，更在于先生对此精神的那份价值自觉与独特思考，足使后辈能用这些思想资源聚合出某个多层次构成的、堪称“现代学统”的整体框架。

现代学统在尊著中似可分“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朴学文体”四个层次，又相辅相成。先看“学术本位”。这是学统之魂，也是迥异于历代儒生“经世致用”之道统的原则界限，用先生的话说，即“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面对学术，“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因为“为用不为用，在乎其人也”。

……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②故凡真学者总能从自己的学识才情、文牍著述中找到人生欣慰，而无须急吼吼地跻身朝廷，似乎只有戴乌纱帽才得安魂。章学诚说得好：“学术与一时风气不必求适合”，“学贵自成一家，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为愧。”^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只须此桥委实契合我的气质、才华、良知和信念，能为自我实现提供最佳机遇，即使世间皆曰学人无足观，亦无碍我当“书呆子”——先生说对了：“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学问“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④，“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⑤。由此联想到近年大陆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心想“学术规范”似可分“价值观念”与“操作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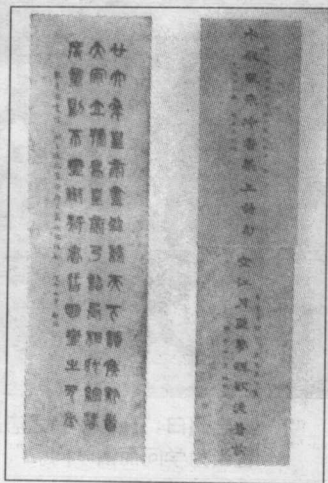
则”两个层面的，若称后者是技术性或工艺性规范，则先生所标举的“为学问而治学问”之价值观当为本原性规范或“元学术规范”。这就是说，若当下学人真能像先生那样敬畏“学术本位”，则其在“操作细则”层面迟早也会循规蹈矩的。



梁启超故居

再看“思想独立”。这是学统之本，“学术本位”正是靠“思想独立”才兑现的。

“思想独立”是为了“贵创”^⑥，欲“贵创”，非“空诸依傍”不可^⑦。何谓“依傍”？著书“全在模仿”，“逼肖古人”是也^⑧。先生所以尊顾炎武为清学之祖，首先是珍视“凡炎武著书，而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⑨。也正是在



梁启超手迹

这意义上，先生称阎若璩伟大，因他曾撰《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此书是以专辨东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而著称于史。“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故自汉武帝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惟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



梁启超曰：“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

6

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

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⑩先生在这里说得多么好呀！它何止“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⑪，分明是慧眼如炬，一瞥洞明古今。恕后辈浅薄，以前只知“思想解放”是新时期才幸逢的当代景观，却不懂清学兴盛之前提，乃在将学术从对封建戒律的“依傍”中“解放”出来，而今看来，天下学术，古今一律。再循此眼光去读尊著，也就豁然开窍先生为何如此推崇戴震，竟赞其“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因为“盖无论何人之言”，戴震“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否则，“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⑫。进而也就明白先生为何如此神往“思想自由”，又为何如此厌恶康有为的“保教”丑剧？因为“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

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饬遗我国民也。”^⑭说白了，“保教”也罢，“依傍”也罢，皆是身着古装的“凡是派”或原教旨主义者，貌似信念坚定，实为思维惰性乃至僵化如朽木不可雕也。

三看“科学归纳”。这是学统之技，别小觑这思辨性工艺，学术研究能否真正历经推敲，自圆其说，全赖此“精良之研究法”，先生甚至命之为“欲一种学术之发达”的“第一要件”^⑮。戴震曾云：“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⑯。假如说，独立思考，空所依傍，是破“人蔽”之法宝；那么，攻克“自蔽”之良方，便是“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了^⑰。正因为先生视归纳法为纯粹科学精神之化身，故也就不难理解先生为何竟断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⑱，且理解先生又为何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细，不厌其烦地复述乾嘉学派的思维运演程序——我揣摩先生的初衷，大概是期待读者能像先生那样设身处地地去体悟治学之甘苦吧。试想戴震为了寻觅科学的“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

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⑩——从“未至十分之见”到“十分之见”，从科学假说到科学定理，其间步骤竟精微曲折如此，再“试思每一步骤进行中，所需资料几何，精力几何，非用极绵密之札记安能致者？”^⑪这当亟需学人全身心投入乃至支付终生的。无怪戴震感慨“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⑫。难就难在：若无献身精神，势必无计攀此境界。这就不仅仅是思辨技巧问题，而已分明转为一个学人的生存方式命题了。

8

末了是“朴学文体”。这是学统之相，人文学术成果之品位、分量或魅力，最终得借文体来凝聚且呈示。先生发现清学流行札记体，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所以被誉为训诂学之名著，“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⑬，原来名著之精义早就蕴结在诸多札记条款中了，而此札记又往往是作者的心得别裁，极可贵且难得，以致顾炎武撰《日知录》时叹喟，真正精到之札记“一年仅能得十余条”^⑭。何以精炼稀贵如此？究其因，无非作者“恒不欲有一字余己所心得之外。”^⑮尼采说他爱读用血写的书，清学札记委实不乏近之者。也正因为清儒治学自律甚严近苛，他们也就“最戒轻率著书”，因著书“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⑯清学之文体包装竟大多质朴如此，故谓“朴学”。先生这一点拨实令我感激。感激之一，是我觅得史鉴一帧，映出当下